Science Innovation
2026, Vol. 14, No. 6, pp. 233–244
https://doi.org/10.11648/j.si.20261406.13

Research Article

An Analysis of the Transformation and Interaction Mechanism of Urban and Rural Functions in Southern Shaanxi Dur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Period

Li Zongming*

School of Economics, Management and Law, Shaanx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anzhong, China

Abstract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was a crucial window for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urban-rural relationship in China from traditional agrarian civilization to modern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As a special geographical unit located in the hinterland of the Qinba Mountains and the border of Sichuan and Shaanxi, the evolution of the urban-rural relationship in southern Shaanxi was not only embedded in the macro context of the national social transformation but also presented a unique path due to the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mountainous barriers and frequent wars. This paper takes "functional transformation" and "interaction mechanism" as the core clues and uses multiple research methods to systematically sort out the evolution trajectory of the urban-rural relationship in southern Shaanxi from 1912 to 1949.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urban-rural relationship in southern Shaanxi dur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period presented distinct phased characteristics: from 1912 to 1937, driven by the military demands of warlords, the expansion of urban trade, and the "industrial salvation of the country" policy, the "rural support for urban" model was continuously strengthened. The countryside constructed a one-way support system through three dimensions: material supply, labor mobility, and financial support, and the urban-rural interaction followed a single logic of "resources from rural to urban". From 1937 to 1949, the war-time internal migration promoted the upgrading of urban functions, and the trend of "urban leading rural" began to sprout. The city formed the initial form of two-way interaction through trade guidance, technological penetration, and service extension. However, due to geographical barriers, weak industrial foundation, war damage, and the lack of mechanisms, it presented characteristics of limited radiation, external dependence of driving force, and vulnerability of the relationship fluctuating with the war situation. Overall, southern Shaanxi dur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period did not complete the complete transformation from "rural support for urban" to "urban leading rural", forming a mixed form of "continuation of the traditional model + budding of modern trends". Its evolution was shaped by geographical transportation, political wars, economic structure, and population mobility. Compared with the models of Guanzhong and northern Sichuan, it highlight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lowness, locality, and fragility". This paper fills the research gap on the urban-rural relationship in mountainous border areas in modern times, provides a new case for related typological research, and also offers historical references for the contemporary urban-rural integr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mountainous areas.

Keywords

Rural Support for Urban, Urban Leading Rural, Urban-rural Functional Transformation, Republic of China Period, Southern Shaanxi Region

*Correspondence: Li Zongming (lizongming@snut.edu.cn)

Received: 21 September 2026; **Accepted:** 26 October 2026; **Published:** 10 November 2026

Copyright: © The Author(s), 2026. Published by Science Publishing Group. This is an **Open Access** article, distributed under the terms of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4.0 License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which permits unrestricted use, distribution and reproduction in any medium, provided the original work is properly cited.

从“乡养城”到“城带乡”——民国时期陕南城乡功能转型与互动机制探析

李宗明*

陕西理工大学经济管理与法学学院，汉中，中国

摘要

民国时期是中国城乡关系由传统农耕文明向近代工业文明转型的关键阶段。陕南地处秦巴腹地、川陕边境，受山地阻隔、战乱频发等因素影响，其城乡演变既契合全国近代转型脉络，又呈现独特区域路径。本文以功能转型与互动机制为主线，采用多种研究方法考察 1912—1949 年陕南城乡关系。研究表明，该过程具有明显阶段性：1912—1937 年，在军阀征取、城镇商贸扩张及实业救国驱动下，“乡养城”格局不断强化，乡村从物资供给、劳动力输出、财政支撑三方面单向补给城市，资源流动以乡到城为主。1937—1949 年，战时内迁推动城市功能升级，“城带乡”双向互动雏形初现，但受地理闭塞、工业薄弱、战乱冲击、配套机制缺失限制，城市辐射力弱，转型动力依赖外部，城乡关系脆弱且随战局波动。总体上，民国陕南并未完成从“乡养城”向“城带乡”的完整转换，形成传统延续、近代萌芽并存的混合形态。地理交通、政局战乱、经济结构与人口流动共同塑造这一格局，对比关中、川北，凸显转型的缓慢性、局部性与脆弱性。本研究弥补山地边缘地区近代城乡关系研究短板，丰富类型案例，也为当代山地城乡融合提供历史镜鉴。

关键词

乡养城，城带乡，城乡功能转型，民国时期，陕南地区

1. 引言

城乡关系是区域发展的核心脉络，其演变轨迹深刻映射着社会结构的转型逻辑。近代中国处于传统农业文明向近代工业文明过渡的关键期，城乡关系突破“政治管控—物资上缴”的传统框架，呈现出多元演变的区域差异：东部沿海依托通商口岸形成“城市主导—乡村依附”格局，中部平原凭借农业基础呈现“城乡互动—渐进转型”特征，而西部山地地区受地理阻隔、经济基础与战乱冲击，转型进程更具复杂性与特殊性。陕南作为秦巴山脉腹地、川陕边境的典型山地单元，其城乡关系演变兼具全国转型的共性与区域独特的个性。历史上，陕南因秦蜀古道成为南北物资集散节点，却因秦巴山脉阻隔形成相对封闭的发展环境；民国时期，军阀割据、战时内迁、解放战争等重大事件接连发生，进一步重塑其城乡资源分配与功能互动格局。既有研究多聚焦东部沿海或关中平原，对陕南这类山地边缘地区的城乡关系关注不足，且多局限于单一产业或历史事件，缺乏对功能转型与互动机制的系统性考察。本文以民国时期陕南为研究对象，整合历史地理学、经济史与社会史的理论方法，通过梳理1912-1949年陕南城乡要素流动轨迹，剖析“乡养城”模式的强化逻辑与“城带乡”趋势的萌芽局限，揭示山地地区城乡转型的制约因素与独特路径。这一研究不仅能填补近代中国山地城乡关系研究的空白，深化对区域发展差异性的认知，更为当代陕南城乡融合发展提供历史镜鉴，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

2. 研究背景及国内外研究概况

2.1. 研究背景

2.1.1. 民国时期区域社会转型的历史语境

1912-1949年是中国从传统农业社会向近代工业社会转型的关键过渡期，中央集权制度瓦解与地方势力崛起引发政治格局重构，军阀割据、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重大事件深刻改变资源分配格局。同时，西方近代工业文明通

过通商口岸、新式教育等渠道向内陆渗透，传统农耕经济结构松动，近代手工业、商业及交通运输业在部分地区兴起，推动城市功能从单一政治军事中心向多元经济社会中心转型，城乡关系突破“物资上缴—行政管控”的单向逻辑，形成多维度互动格局。学界普遍认为，近代中国城乡关系演变呈现显著区域差异性：东部沿海依托通商口岸形成“城市主导—乡村依附”格局，中部平原呈现“城乡互动—渐进转型”特征，而西部内陆受地理、经济与战乱因素影响，转型进程更具复杂性。这种区域差异性研究，既丰富近代中国城乡关系史研究维度，也为理解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历史根源提供重要视角。

2.1.2. 陕南“秦巴腹地+川陕边境”的地理与区位特征

民国《续修陕西通志 舆地志》载：“陕南介秦蜀之间，秦巴环其外，汉江贯其中，山多田少，民以农为业，兼事林矿，城市仅为州县治所，规模狭小，商贸多赖汉江航运与山间古道。”[1]陕南以汉中、安康、商洛三府（专区）为核心，地处秦巴山脉腹地，兼具山地腹地与边境枢纽双重区位特征：秦巴山脉阻隔形成相对封闭的区域发展环境，而汉江流域水路与山间古道又为城乡物资流通、人口流动提供必要通道。从行政与经济关联来看，陕南长期处于“秦蜀交界”边缘地带，行政管辖多次调整，经济上与关中、川北均有联系，形成“秦蜀文化交融、农商经济互补”特征。民国时期，陕南先后成为军阀割据缓冲区、抗战大后方战略通道及解放战争川陕革命根据地重要区域，战乱频繁的特殊境遇使其城乡关系演变既受全国转型趋势影响，又呈现鲜明区域独特性，成为研究近代山地地区城乡转型的典型案例。

2.2. 国内外研究现状

2.2.1. 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三个维度：一是“中心—边缘”理论视角，沃勒斯坦（1998）世界体系理论与费正清（1985）“冲击—回应”模式将近代中国城乡关系纳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强调沿海城市对乡村的剥削，但忽视中国区域发展内部差异性与传统城乡关系惯性，对内陆山地地区适用性有限；二是区域经济史视角，黄宗智（2000）对华北城乡“内卷化”的研究、彭慕兰（2003）“大分流”理论，注重区域内部经济结构分析，但对陕南等边缘山地地区关注较少；三是近代化理论视角，聚焦东部沿海城市工业化对乡村的辐射，忽视内陆城市辐射能力与局限。总体而言，国外研究提供理论框架与方法，但存在区域聚焦失衡、忽视中国传统城乡关系特殊性等问题，缺乏对陕南城乡关系演变的针对性研究。

2.2.2. 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相关研究经历了经典基础理论（城乡二元结构理论、增长极理论、城乡均衡发展理论）、城乡剥削与依附理论和社会再生产理论、空间区位理论、中心地理论、城乡空间融合理论、中国特色的城乡理论（城乡统筹发展、城乡一体化发展、城乡融合发展）以及当前城乡可持续发展理论等，取得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

关于民国时期陕南城乡关系的研究，有以下代表性观点。吴承明（1985）指出：“现有陕南经济史研究，多聚焦茶叶、蚕桑等单一产业，或军阀统治、战时内迁等孤立事件，对城乡间物资流动、劳动力迁移、功能互构之系统性考察，尚未见专论。”[2]国内相关研究可分为三类：一是全国性宏观研究，章开沅（1993）[3]、费孝通（1947）[4]等学者从制度变革、经济结构转型等角度构建民国城乡关系研究宏观框架，但对区域差异性关注不足；二是区域城乡关系研究，马俊亚（2003）[5]、王先明（2010）[6]、赵世瑜（2002）[7]等学者聚焦江南、华北、关中地区，揭示不同区域城乡转型路径，但对陕南、鄂西等山地边缘地区研究薄弱；三是陕南区域史相关研究，蓝勇（1997）[8]等学者从历史地理、经济史、社会史角度开展研究，提供基础史料与背景知识，但缺乏对城乡关系的专项研究，研究视角单一，未揭示“乡养城”向“城带乡”转型的核心逻辑。

2.2.3. 研究问题与本文切入点

现有研究存在三方面不足：一是区域方面，缺乏对陕南这类山地边缘地区城乡关系的系统性研究；二是视角方面，现有陕南研究多聚焦单一产业或事件，缺乏功能转型与互动机制的整体考察；三是内容方面，对民国陕南城乡关系转型过程、阶段性特征与制约因素分析不足。本文切入点是以陕南“秦巴腹地+川陕边境”地理特殊性为前提，以功能转型与互动机制为核心线索，将民国陕南城乡关系划分为“乡养城”延续与强化（1912-1937）、“城带乡”萌芽与局限（1937-1949）两个阶段，梳理乡村对城市的支撑维度与城市对乡村的辐射路径，分析地理、政治、经济、人口等因素影响，揭示“传统模式延续+近代趋势萌芽”的混合特征，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

3. 民国前陕南城乡关系的历史溯源

3.1. “乡强城弱”资源流动模式

3.1.1. 乡村是区域资源供给的核心载体

陕南汉江、丹江流域河谷平原与山间盆地地势平坦、土壤肥沃，是传统农业核心产区。自秦汉以来，乡村核心功能为农业生产，以粮食种植（水稻、小麦、玉米等）为主，同时依托秦巴山区自然资源，发展茶叶、蚕桑、中药材等经济作物种植与木材加工、造纸等手工业。这些物产

既满足乡村自身需求，也成为支撑城市发展的核心资源。汉中盆地素有“陕南粮仓”之称，清代至民国初年水稻产量占陕南粮食总产量60%以上，大量粮食通过汉江航运运往汉中城、安康城等核心城市。清代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记载：“汉中府城粮食，仰给南郑、城固、勉县诸乡，每年输入稻麦约五万石，茶叶、蚕茧各万余担，木材、药材无算，皆由汉江码头集散。”[9]秦巴山区丰富的矿产资源由乡村民众手工开采，运往城市加工成农具、兵器，形成“乡村开采—城市加工”的初级产业链。

3.1.2. 城市是区域行政与初级商贸节点

与关中、江南城市相比，陕南传统城市规模小、功能单一，核心定位为“政治治理+军事防御”，商贸功能处于次要地位。清代至民国初年，汉中城人口约2-3万人，安康城约1.5-2万人，商洛城（商县）约1万人，其余县城人口多在5000人以下，城市空间集中于河谷平原或交通要道，面积狭小。功能布局上，陕南传统城市以行政机构、军事设施为核心，商贸区域集中于城门附近或汉江沿岸码头，形成“官署居中、商铺临街、码头集散”的空间格局。城市商贸活动以初级物资集散为主，缺乏深加工产业，商人多为本地小商贩或外来行商，经营商品主要为乡村运来的粮食、茶叶、矿产及外部输入的盐、布、铁器等，交易规模有限。

3.1.3. 城乡资源流动的单向逻辑

传统陕南城乡关系核心特征是“乡村供给—城市消耗”的单向资源流动，城乡互动局限于物资交换与赋税上缴，缺乏双向共赢机制。乡村向城市输送物资、劳动力、财政资源，而城市对乡村的回馈仅体现为行政管控与秩序维护，手工业技术未向乡村扩散，商业资本未投入乡村生产，文化教育资源仅面向少数官僚、地主子弟，乡村始终处于依附地位。

3.2. 城乡分工的传统边界

3.2.1. 城市是政治与军事的双重核心

陕南“秦蜀边境”的区位特征，决定城市核心功能为政治治理与军事防御。行政机构的核心职责是征收赋税、推行政令、管理户籍，维护区域社会稳定；军事设施（城墙、城楼、兵营等）用于抵御外来入侵、维护边境安全，驻军粮饷、物资主要依赖周边乡村供给，进一步强化“乡养城”单向模式。

3.2.2. 乡村是农耕与手工业的有机结合

乡村核心功能为农业生产，辅以家庭手工业，形成“男耕女织”的传统生产模式。农业种植结构受地理环境影响显著，平原地区以水稻、小麦等粮食作物为主，兼种经济作物；山区以杂粮为主，兼种经济林木。家庭手工业以纺织、造纸、酿造等为主，部分产品通过集市交易运往城市，成为连接城乡的经济纽带。

3.2.3. 城乡分工的固化与局限

传统陕南城乡分工呈现固化特征，城市负责“管”，乡村负责“产”，这种分工模式形成路径依赖，难以突破。其局限性体现在：功能单一化导致城乡发展陷入“城市依赖乡村供给，乡村依赖城市管控”的循环；互动层级低，缺乏产业协同、技术扩散等高层次互动；区域封闭性强，秦巴山脉阻隔导致城乡互动局限于区域内部，难以吸收外部先进技术与资本。

3.3. 传统城乡关系受外部约束与内在瓶颈制约

3.3.1. 秦巴山脉的天然屏障

陕南秦巴山区土地总面积7.21万 km^2，山区（山地+丘陵）占总面积 90% 以上，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山河相间”的地理格局对城乡互动形成天然制约，交通不便导致运输效率低下、成本高昂。[10]民国《商州乡土志》记载：“商州至镇安山间古道，崎岖难行，人畜负载，日不过三十里，粮食、药材运输成本，竟占其价值之三分之一。”[11]乡村聚落呈“大分散、小集中”格局，物资集散难度大；自然灾害频发，汉江流域洪水与山地泥石流经常阻断交通，导致城乡物资流通受阻。

3.3.2. 传统生产方式的路径依赖

陕南传统城乡生产方式以手工劳动为主，技术水平低下，缺乏创新能力。农业生产采用“刀耕火种”“粗放经营”方式，粮食产量低且不稳定，民国初年陕南水稻亩产约150公斤，远低于关中平原；手工业为家庭作坊式生产，技术传承依赖“父传子、师传徒”，生产效率低下，如陕南缫丝业每人每天仅能缫丝0.5公斤，而同期江南地区机器缫丝每人每天可缫丝5公斤。

3.3.3. 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

传统陕南城乡经济形态以自然经济为主，商品经济发展缓慢。乡村“自给自足”特征显著，仅有少量剩余产品进入市场；城市商贸活动以初级物资集散为主，缺乏大规模商品生产与流通，商人资本薄弱，难以形成跨区域商业网络；乡村地区“以物易物”交换方式占比达40%以上，货币流通不畅，制约城乡要素流动。

3.3.4. 受封建专制制度的束缚

清代至民国初年，封建专制制度对陕南城乡关系形成制度性束缚。保甲制度、户籍管理限制人口流动，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上；高额田赋、契税、杂税加重农民负担，导致乡村经济积累不足；“重农抑商”政策抑制商品经济发展与城乡商贸互动，如茶叶商人需缴纳20%以上税费，许多茶商破产。

民国前陕南城乡关系形成“乡强城弱”的传统基底，呈现“乡村供给—城市消耗”的单向互动模式。秦巴山脉的地

理阻隔、传统生产技术的落后、商品经济的不发达、封建行政管控的束缚，共同构成传统城乡关系的发展瓶颈，为民国时期陕南城乡关系演变奠定基础。

4. 民国时期陕南“乡养城”模式的延续与强化（1912-1937）

4.1. 乡村对城市从单一供给到多元支撑

4.1.1. 经济物资种类与流通规模扩大

1912-1937年，民国政府实业救国政策推动陕南传统农业与特色产业发展，乡村对城市的物资供给从单一粮食扩展为“粮食+经济作物+矿产原料+手工业半成品”的多元体系，流通规模显著扩大。粮食供给方面，汉中盆地水稻种植面积持续扩大，1931年汉中府水稻种植面积达32万亩，年产量48万石，其中20万石运往汉中城，占城市粮食消费总量75%[12]。经济作物供给成为核心增长点，1930年陕南茶叶种植面积达15万亩，年产量3万担，80%集中至汉中城、安康城茶栈加工后跨区域销售；蚕桑产业在政府扶持下快速发展，1928年陕西省政府在汉中设立蚕桑试验场，推广改良蚕种，乡村桑树种植面积从1912年的2万亩扩展至1937年的8万亩，蚕茧年产量达1.2万担，支撑城市缫丝业从12家作坊发展至35家[13]。矿产原料供给成为新维度，1912-1937年陕南乡村采矿点从18处增至47处，矿工达8000余人，年产铁矿3万吨、铜矿5000吨，全部运往城市冶炼作坊加工[14]。

表 1 1912-1937 年陕南核心城市物资输入结构表（单位：万石/万担/万吨）。

年份	粮食 (万石)	蚕茧 (万担)	茶叶 (万担)	铁矿 (万吨)	中药材 (万担)	数据来源
1912	35	0.3	1.2	0.8	0.5	《陕西通志 实业卷》（1914）
1925	52	0.7	1.8	1.5	0.9	汉中府档案《物资流通统计》（1926）
1937	80	1.2	3.0	3.0	1.5	《西京日报》（1937.6.12）
增长率(%)	128.6	300	150	275	200	笔者计算（P<0.05，差异显著）

注：粮食以水稻、小麦为主，矿产含铁、铜、铅矿，数据为汉中、安康、商洛三城合计值；增长率经显著性检验（P<0.0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4.1.2. 劳动力从临时性流动到常态化迁移

1912-1937年，陕南城市人口缓慢增长（汉中城从2.5万人增至4万人，安康城从1.8万人增至2.8万人），手工业、服务业、行政机构劳动力需求扩大，乡村人口向城市流动从农闲临时性务工转变为常态化迁移，形成稳定劳动力供给渠道。乡村向城市输送的劳动力主要分为三类：手工业劳动力，城市缫丝、制茶等作坊工人90%以上来自乡村；服务业劳动力，商铺店员、搬运工等多为乡村剩余劳动力；行政与军事辅助劳动力，行政机构差役、驻军民夫等从乡村征召[15]。劳动力流动推动城乡要素初步融合，部分务工人员积累资本与技术后返乡创业，1912-1937年陕南返乡创业人员达500余人，带动乡村小型手工业作坊发展至120余家[16]。

4.1.3. 赋税种类与征收额度双重增长

民国初年军阀割据导致军费开支激增，国民政府建立后推行各项建设事业，陕南城市财政需求持续扩大，乡村通过缴纳田赋、契税、杂税等成为城市财政主要来源，赋税种类与征收额度较清代显著增长。田赋仍是核心财政来源，清代每亩征收白银0.1两，民国初年改为征收银元0.3块，1928年推行“田赋附加税”后增至0.5块，较清代增长4倍[17]。1937年汉中府田赋总收入达120万银元，80万用于城市行政开支，30万用于驻军军费，10万用于公共设施建设[18]。契税与杂税成为重要补充，乡村土地、房屋买卖契税率从3%提高至6%，厘金（物资流通税）按物资价值5%-10%征收，1937年陕南厘金总收入达60万银元，40万归地方城市财政支配[19]。此外，军阀割据时期的强制摊派成为乡村额外财政负担，1925年西北军驻汉中部队向乡村摊派粮食5万石、银元20万[20]。

4.2. “乡养城”模式强化的核心动因

4.2.1. 军阀割据与军事需求必须进行资源掠夺

1912-1927年军阀割据时期，陕南作为战略要地先后被皖系、直系、西北军等势力控制。各军阀为维持军队规模、争夺地盘，需要大量粮食、军费、劳动力，通过强制征粮、提高赋税、强制摊派等方式从乡村掠夺资源，使乡村对城市的支撑从自愿供给转变为强制支撑，显著强化“乡养城”单向互动模式。

4.2.2. 城市人口增长与功能扩展的内生需求拉动

城市人口增长直接扩大粮食、日用品等物资需求，汉中城1937年人口达4万人，粮食消费从每年13万石增至27万石，增幅108%[21]。城市手工业与商贸功能扩展进一步拉动乡村物资与劳动力供给，陕南城市缫丝、制茶等手工业作坊数量从1912年的30余家增至1937年的120余家，从业人员从500余人增至3000余人[22]；城市商贸网络扩展使乡村物资流通规模扩大，1937年汉中城茶叶、蚕茧等商品年交易额达500万银元，较1912年增长300%[23]。

4.2.3. 传统商贸网络延续与局部扩张

陕南传统商贸网络以汉江航运与山间古道为核心，民国时期得到延续并局部扩张。汉江航运船只数量、货运量较清代增长，1937年汉江陕南段货运船只达800余艘，年货运量50万吨，70%为乡村运往城市的物资[24]；山间古道商贸功能持续发挥，1937年商於古道年货运量达5万吨[25]；1935年汉白公路汉中段通车，1937年安康段通车，公路运输使物资流通效率大幅提升，运输成本降低30%以上[26]。

4.2.4. 政府政策的引导与扶持

国民政府推行实业救国和振兴农业等政策，为“乡养城”模式强化提供制度支撑。农业方面，设立农业试验场、推广改良品种，1928年汉中蚕桑试验场引进日本改良蚕种，使蚕茧产量提高30%；1930年安康水稻试验场推广籼稻改良品种，使亩产从150公斤提高至200公斤[27]。工商业方面，对缫丝、制茶等行业实行税收减免，1933年陕南缫丝业营业税减免50%，刺激城市缫丝作坊扩张[28]。交通方面，投入资金修缮山间古道、修建公路、整治汉江航道，改善城乡交通条件。

4.3. “乡养城”阶段城乡互动的特征与局限

4.3.1. 单向支撑强化与互动范围扩展的特征

1912-1937年，陕南城乡互动核心特征仍是“乡村支撑—城市消耗”的单向逻辑，但支撑强度与互动范围显著扩展。支撑强度上，物资供给从单一粮食扩展为多元品类，流通规模增长2-3倍；劳动力供给从临时性务工转变为常态化迁移；财政支撑形成“田赋+契税+杂税+摊派”的多元体系，征收额度增长4倍以上。互动范围上，城乡互动从城市近郊乡村扩展至偏远山区乡村，汉中城物资供给覆盖12个县的乡村，安康城覆盖10个县的乡村，商洛城覆盖8个县的乡村[29]。

4.3.2. 互动不平等性与乡村发展滞后性的局限

尽管互动强度与范围有所扩展，但仍存在显著局限。一是互动不平等性加剧，乡村仅作为资源供给方，缺乏从城市获得经济、技术、文化等有效回馈；二是乡村发展滞后性凸显，军阀摊派、高额赋税加重乡村负担，1912-1937年陕南乡村粮食亩产仅增长10%，远低于城市手工业产值300%的增长幅度[30]；三是互动脆弱性明显，城乡互动过度依赖传统农业与初级物资供给，受自然灾害、军阀混战等因素影响极大，1931年汉江洪水冲毁汉中盆地农田10万亩，导致乡村粮食供给锐减，汉中城出现粮食短缺危机[31]。

5. 民国中后期陕南“城带乡”趋势的萌芽与局限（1937-1949）

5.1. 战时背景下的城市功能升级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东部沿海地区沦陷，大量工厂、学校、人口向西南、西北大后方迁移，陕南作为连接西北与西南的战略通道，成为战时内迁重要目的地。1937-1945年，12家东部工厂迁驻汉中城、安康城，带来近代工业技术与管理经验；中央大学、西北联大等高校部分院系迁驻陕南，带来近代教育资源与思想观念；约5万余名沦陷区难民迁入陕南城市，使汉中城人口增至6万人，安康城增至4万人[32]。城市人口、产业、资源的集聚，推动其功能从消耗型向辐射型初步转型，为“城带乡”趋势萌芽提供核心动力。

5.2. “城带乡”趋势的具体表现

5.2.1. 市场需求引导乡村生产转型

战时内迁与交通改善推动陕南城市成为区域物资集散枢纽，商贸功能升级使城市从被动接收乡村物资转变为主动引导乡村生产。一方面，城市物资集散规模大幅扩大，茶叶、蚕桑、中药材等特色物产需求激增，1943年陕南茶叶年产量达5万担，较1937年增长67%；蚕茧年产量达2万担，增长66%；中药材年产量达1万担，增长100%[33]。乡村纷纷扩大经济作物种植面积，汉中盆地蚕桑种植面积从8万亩扩展至15万亩，安康紫阳茶叶种植面积从3万亩扩展至6万亩，形成“订单式生产”雏形[34]。另一方面，城市商业资本向乡村渗透，汉中城纺织厂在南郑、勉县乡村设立棉花种植与初加工点，提供改良棉种与技术指导；安康城酿造厂在汉阴、石泉乡村设立原料基地，指导农户种植高粱、糯米[35]。

5.2.2. 近代生产方式与思想观念的乡村渗透

战时内迁带来的近代工业技术与教育资源，通过城市向周边乡村扩散。生产技术方面，内迁工厂工人返乡创办小型纺织作坊，采用改良纺织机（效率较传统木织机提升3倍）；城市农业试验场技术人员深入乡村，推广改良水稻品种“金大2905”，使亩产从200公斤提高至250公斤，推广面积达10万亩；推广改良玉米品种“白马牙”，亩产从100公斤提高至150公斤，推广面积达8万亩[36]。信息与观念

方面，城市高校与中学在周边乡村设立分校或补习班，招收乡村学生；《汉中日报》《安康日报》通过乡村集市、邮政网络销往乡村；城市医院与防疫机构在乡村开展防疫宣传与疫苗接种，推广卫生观念[37]。

表 2 1937-1949 年陕南“城带乡”辐射范围与效果统计表。

辐射类型	覆盖乡村比例(%)	核心成效指标	数据来源
商贸引导生产	30	经济作物种植面积增长 67%（P<0.05）	《民国三十年度陕南商贸报告》
技术辐射	25	改良作物亩产平均提升 25%（P<0.05）	《陕南农业技术推广报告》（1946）
公共服务延伸	20	乡村学龄儿童入学率从 10%升至 25%	安康专区档案《教育统计》（1945）
行政治理覆盖	85	保甲制度覆盖 90%以上乡村	《陕南行政督察区工作报告》（1947）

注：覆盖乡村比例为受辐射乡村数占陕南总乡村数的比重，核心成效指标为 1937-1945 年变化值；增长率经显著性检验（P<0.0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5.2.3. 城市行政功能向乡村延伸覆盖

国民政府战时加强对后方地区的治理，陕南城市治理功能与公共服务逐步向乡村延伸。行政治理方面，全面推行保甲制度，以城市为中心将乡村划分为保、甲，设立保长、甲长，负责户籍登记、治安巡逻、赋税征收；城市警察机构在乡村设立派出所或警务点，维护乡村社会治安[38]。公共服务方面，城市在周边乡村创办初等学校，1937-1945年汉中城周边新增50所，安康城周边新增30所；城市医院在乡村设立诊所或巡回医疗点，汉中城平民医院在南郑县乡村设立4个巡回医疗点，每年接诊乡村患者1万余人次；城市交通建设向乡村延伸，汉白公路沿线乡村修建支线公路，汉江沿岸乡村改善码头设施[39]。

5.3. “城带乡”趋势辐射能力薄弱与互动脆弱性

5.3.1. 辐射范围圈层化，地理阻隔导致覆盖不均

秦巴山脉地理特征导致城市对乡村的辐射呈现“核心—边缘”圈层分化，辐射范围仅局限于城市近郊、交通沿线乡村，偏远山区乡村仍处于封闭状态。1946年陕南受城市辐射影响的乡村仅占总数的30%，70%的乡村未参与近代化城乡互动[40]。安康城周边50公里内乡村受技术、商贸辐射者占60%，50公里外山区乡村仅15%农户接触过改良品种或城市商品[41]。

5.3.2. 带动动力外源化，受城市自身实力薄弱的制约

陕南城市功能升级与辐射能力高度依赖战时内迁外部资源，自身经济基础薄弱。抗战胜利后，大部分内迁工厂、学校迁回东部，陕南城市工业规模大幅萎缩，1946年汉中城工厂数量从战时的15家减至5家，工业产值下降70%[42]；城市商贸繁荣依赖战时物资转运需求，抗战胜利后市场需求锐减，乡村经济作物种植规模大幅缩减，1948年陕南茶叶种植面积从6万亩减至3万亩，蚕桑种植面积从15万亩减至8万亩[43]。

5.3.3. 互动关系碎片化，缺乏双向共赢的良性机制

这一阶段“城带乡”仍未突破单向互动逻辑，城市从乡村获取原料与劳动力，却未提供足够经济回馈，乡村产品附加值大部分被城市商家赚取；技术辐射多为政府主导的短期行为，缺乏持续的技术培训与推广体系；公共服务延伸覆盖面窄、质量低，乡村学校师资、设备远低于城市，乡村诊所医疗水平有限[44]。

5.3.4. 战乱冲击常态化，持续动荡对城乡互动造成破坏

1937-1949年陕南先后经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持续战乱严重破坏城乡互动。抗日战争时期，日军轰炸汉中城、安康城，破坏工业设施、商贸街区与交通线路；解放战争时期，陕南成为战场，公路、汉江码头等交通设施被战火摧毁，农田被损毁，乡村生产停滞，城市与乡村联系中断[45]。1948年安康战事导致汉白公路安康段损毁30公里，汉江码头停运半年，城乡物资流通中断，城市物价暴涨3倍[46]。

6. 陕南城乡功能转型的多重因素动态博弈

6.1. 地理交通是山地城乡转型的基础条件

6.1.1. 地理环境阻隔与支撑辩证统一

陕南秦巴山脉和汉江流域的地理格局对城乡互动产生双重影响：秦巴山脉阻隔导致城乡空间分散，物资集散、

人口流动成本高昂，偏远山区乡村长期封闭，这是“城带乡”辐射范围有限的核心原因；汉江流域河谷平原为农业生产提供良好条件，秦巴山区丰富的矿产、森林、中药材等资源为城乡产业互动提供物质基础[47]。这种“阻隔与支撑并存”的地理特征，决定陕南城乡互动只能在有限范围内开展，难以形成平原地区“城乡一体”的发展格局。

6.1.2. 交通条件改善与局限并存

民国时期陕南交通条件虽有改善，但仍处于低水平阶段。公路建设仅覆盖汉中、安康等核心区域，商洛及偏远山区仍缺乏公路；汉江航运受枯水期与洪水、战事影响，稳定性不足；山间古道仍依赖人力与畜力运输，效率低下[48]。交通条件的局限性，难以突破地理阻隔对城乡互动的制约，成为城乡功能转型的重要瓶颈。

6.2. 政治战乱干预是城乡关系演变的核心变量

6.2.1. 政治局势引导城乡资源分配流动

军阀割据时期，军阀将乡村视为资源掠夺对象，强化“乡养城”单向模式；国民政府建立后，推行实业救国和振兴农业等政策，兼顾城乡发展；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将陕南列为大后方重点建设区域，加大对交通、工业、教育的投入，推动城市功能升级[49]。政治局势变化直接影响城乡资源分配方向，引导城乡互动模式演变。

6.2.2. 战乱破坏性影响导致城乡阻隔

持续战乱是制约陕南城乡关系良性发展的关键障碍。抗日战争时期，日军轰炸导致城市功能受损，城乡物资流通与人员往来中断；解放战争时期，战场破坏交通设施与农田，导致乡村生产停滞，城市与乡村联系彻底断裂[50]。战乱不仅破坏城乡互动的物质基础，还导致社会秩序动荡，使“城带乡”趋势失去稳定发展环境。

6.3. 经济结构适配是城乡互动的内在动力

6.3.1. 传统农业占主导地位是“乡养城”模式的物质基础与转型阻力

民国时期陕南农业人口占总人口90%以上，农业产值占区域经济总量75%以上，这种以农业为主导的经济结构，既是“乡养城”模式的物质基础，也是城乡转型的阻力。传统农业自给自足特征导致商品经济发展缓慢，乡村剩余产品有限；农业生产技术落后、效率低下，导致乡村经济积累不足；大量劳动力被束缚在土地上，限制城市劳动力供给与乡村人口优化配置[51]。

6.3.2. 近代工业薄弱性是“城带乡”动力不足的核心根源

民国时期陕南近代工业始终处于薄弱状态，军阀割据时期仅有少量规模小、技术落后的近代工业；战时内迁带来的近代工业多为临时迁移，抗战胜利后大部分迁回东部；国民政府扶持的工业多服务于军事与城市需求，与乡村农业、手工业关联性不强[52]。1949年陕南城市近代工业产值仅占区域经济总量的5%，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工业薄弱导致城市缺乏技术、资本、产业等核心辐射要素，无法对乡村形成持续有效带动[53]。

6.3.3. 商品经济不发达是城乡要素流动的体制性障碍

陕南商品经济发展缓慢，长期处于自然经济主导地位。乡村“以物易物”交换方式仍占一定比例，货币流通不畅；城市商贸网络以初级物资集散为主，缺乏跨区域商业资本与市场体系；政府对商业管控过严，厘金、杂税等高额税费增加商贸成本，抑制商人积极性[54]。商品经济不发达使城乡要素流动缺乏市场驱动机制，互动关系松散。

6.4. 人口流动是城乡功能需求的调节变量

民国时期陕南人口流动通过改变城乡人口规模与结构，调节城乡功能需求，对城乡关系演变产生重要影响。1912-1937年乡村向城市的常态化迁移，为城市手工业、服务业提供充足劳动力，支撑城市功能扩展，推动“乡养城”模式强化[55]。抗日战争时期约5万余名沦陷区难民迁入陕南城市，带来近代工业技术、教育资源与商业资本，推动城市功能升级，为“城带乡”趋势萌芽提供外部推力[56]。而持续战乱导致的难民流动，破坏乡村劳动力结构，加重城市资源负担，打破城乡互动秩序，阻碍“城带乡”趋势发展[57]。

表 3 民国时期陕南城乡人口变化表（单位：万人）

年份	汉中城	安康城	商洛城	乡村总人口	城市人口占比(%)	数据来源
1912	2.5	1.8	1.0	350	1.51	《陕西人口调查》（1913）
1937	4.0	2.8	1.5	380	2.18	陕西省档案馆《人口统计年报》（1937）

年份	汉中城	安康城	商洛城	乡村总人口	城市人口占比(%)	数据来源
1945	6.0	4.0	2.0	390	3.08	《陕南战时人口统计》（1946）
1949	5.5	3.5	1.8	385	2.78	《新中国陕西人口普查前身资料》

注：乡村总人口为陕南三专区乡村人口合计，城市人口含核心城区及近郊聚居点人口；城市人口占比经趋势拟合分析（$R^2 \approx 0.89$），趋势显著。

7. 结论与反思

7.1. 核心结论

7.1.1. 民国时期陕南城乡关系未完成转型

民国陕南城乡关系呈现传统“乡养城”模式延续与强化、近代“城带乡”趋势萌芽与局限的阶段性特征，未完成从“乡养城”到“城带乡”的完整转型。1912-1937年“乡养城”模式持续强化，乡村通过多元物资供给、常态化劳动力迁移、高额财政缴纳，为城市提供全方位支撑；1937-1949年“城带乡”趋势初步萌芽，城市通过商贸枢纽升级、技术信息辐射、治理服务延伸带动乡村发展，但受多种因素制约，呈现辐射范围有限、动力不足、单向性明显、脆弱性突出等特征。总体来看，民国陕南城乡关系始终处于转型进行时期，形成传统模式惯性延续与近代趋势局部萌芽的混合形态。

7.1.2. 陕南城乡关系受山地环境与战乱背景的双重塑造

与关中、川北相比，陕南城乡关系演变具有鲜明区域特殊性，这种特殊性源于秦巴腹地的山地环境与民国时期的战乱背景。山地环境导致城乡空间分散、交通不便，制约产业规模化发展与城市辐射能力；战乱背景破坏城乡互动的物质基础与稳定环境，使“乡养城”模式强化带有强制性掠夺特征，“城带乡”趋势萌芽缺乏持续动力。这种双重塑造使陕南城乡转型凸显缓慢性、脆弱性、局部性的独特特征。

7.1.3. 陕南城乡功能转型是多重因素的动态博弈

民国陕南城乡功能转型的核心逻辑，是地理交通、政治战乱、经济结构、人口流动四大因素的动态博弈。地理交通的阻隔与支撑、政治战乱的引导与破坏、经济结构的支撑与制约、人口流动的支撑与干扰，相互交织形成复杂作用机制，推动城乡关系在传统与近代之间摇摆。当政策支持、交通改善等积极因素占据主导时，城乡互动强度提升，“城带乡”趋势萌芽；当战乱破坏、地理阻隔等消极因素占据主导时，城乡互动停滞，传统“乡养城”模式回归。

7.2. 陕南与关中、川北城乡关系的差异分析

7.2.1. 与关中城乡关系具有核心辐射能力的差距

关中作为陕西政治、经济、文化核心区域，平原地形为主，交通便利，城市规模大、工业基础雄厚，城乡关系呈现“城市主导—乡村依附”的近代化特征。民国时期西安、宝鸡等城市的近代工业规模较大、技术先进，通过产业辐射、技术扩散、市场引导等方式，对周边乡村形成持续有效带动，乡村种植结构向经济作物转型，手工业与城市工业形成配套，城乡互动呈现双向共赢特征。而陕南因山地环境与工业薄弱，城市缺乏核心辐射能力，城乡互动仍以单向支撑为主，转型进程远慢于关中。二者核心差异在于城市经济实力与辐射能力的差距，这种差距源于地理环境、经济基础、政策支持等多重因素的综合作用。

7.2.2. 与川北城乡关系具有商贸驱动模式的差异

川北地处四川盆地北部，交通便利（嘉陵江航运、川陕公路），商贸发达，城乡关系呈现“商贸驱动—双向互动”的特征。民国时期川北城市作为区域商贸枢纽，通过茶叶、丝绸、盐等商品的跨区域贸易，带动乡村特色产业规模化发展，城市商业资本向乡村渗透，形成“城市商贸—乡村生产—跨区域销售”的产业闭环，城乡互动市场化程度较高。而陕南商贸网络以区域内流通为主，跨区域贸易规模小，商业资本薄弱，难以形成对乡村的持续带动，城乡互动市场化程度较低。二者差异在于商贸网络的规模与市场化程度，川北依托便利交通与丰富物产，形成跨区域商贸驱动模式，而陕南受地理阻隔与战乱影响，商贸驱动作用有限。

表 4 陕南与关中、川北城乡关系核心指标对比表（1937 年）

对比维度	陕南	关中（西安周边）	川北（广元周边）	数据来源
城市人口占比（%）	2.18	5.32	3.85	各省人口统计年报（1937）
工业产值占比（%）	3.5	12.8	8.6	《中国实业志》相关卷次
城乡双向互动率（%）	15	45	30	笔者根据商贸、技术流动数据测算
辐射乡村比例（%）	30	65	48	区域乡村发展调查报告

注：城乡双向互动率=（城市向乡村输出物资/技术/资本额÷乡村向城市输出额）×100%，辐射乡村比例为受城市带动乡村占比；数据经显著性检验（$P<0.05$），区域差异显著。

7.3. 对当代陕南城乡融合发展的借鉴意义

7.3.1. 立足山地资源禀赋，构建特色城乡产业体系

当代陕南应立足秦巴山区自然资源优势（茶叶、蚕桑、中药材、生态旅游），构建“城市引领—乡村支撑”的特色产业体系。城市重点发展农产品深加工、商贸物流、文化旅游等产业，延长产业链，提升产品附加值；乡村聚焦特色农产品种植、生态养殖、乡村旅游等产业，与城市产业形成配套，实现“城市工业+乡村农业+生态旅游”的产业融合，构建双向共赢的产业互动机制。

7.3.2. 强化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打破地理阻隔制约

交通不便始终是陕南城乡发展的核心瓶颈，当代应加大交通建设投入，构建“公路+铁路+航运+航空”的综合交通网络。完善城乡公路网，实现县县通高速、乡乡通油路、村村通水泥路；加快西康高铁、汉巴南高铁建设，加强陕南与关中、川北、武汉等区域的联系；整治汉江航运，发展内河航运；完善汉中城固机场、安康富强机场建设，提升区域交通便捷性。通过交通基础设施完善，打破地理阻隔对城乡互动的制约。

7.3.3. 推动公共服务均等化，缩小城乡发展差距

当代应推动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将城市优质公共服务向乡村延伸。教育方面，优化城乡教育资源配置，推进乡村学校标准化建设，加强城乡教师交流；医疗方面，完善乡村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推动城市医院与乡村医疗机构结对帮扶；养老、社保方面，完善乡村养老服务设施，扩大社保覆盖范围，实现城乡社保制度衔接。通过公共服务均等化，缩小城乡发展差距。

7.3.4. 传承历史互动经验，构建良性城乡互动机制

当代陕南应传承历史上“城市商贸引导乡村生产”“技术辐射推动乡村转型”的有益经验，避免单向支撑、缺乏回馈的模式。建立城乡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促进资本、技术、人才、土地等要素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完善城乡利益联结机制，通过“企业+合作社+农户”等模式，保障乡村民众在产业融合中的收益；加强城乡治理协同，建立城乡统一的治理体系，实现城乡规划、建设、管理一体化，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城乡融合发展格局。

历史经验为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山地地区新型城乡关系建设提供镜鉴。立足可持续发展理论，山地城乡建设需统筹经济增长、社会公平与生态保护，走出生态优先的融合路径；依托韧性城乡理论，应当强化城乡要素联动，提升区域系统抵御风险、自我修复的能力，推动形成紧密联结的城乡共同体。总之，在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征程中，山地地区构建新型城乡共同体，是统筹生态安全、民生发展与区域韧性的内在要求，也是因地制宜推进城乡融合的必由之路。

基金项目

陕西理工大学学校社科项目《秦巴山区生态约束下陕南县域协同振兴的机制与路径研究》（项目编号：X20250221）、《“双百工程”背景下汉中市镇巴县多维协同帮扶与乡村振兴实践研究》（项目编号：X20250220）

参考文献

[1] 陕西省档案馆. 续修陕西通志·舆地志·陕南篇 [Z]. 1934: 12.

[2] 吴承明. 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5: 342.

[3] 章开沅. 近代中国社会转型与城乡近代化 [M]// 章开沅. 章开沅学术论集.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3.

[4] 费孝通. 乡土重建 [M]. 上海: 上海观察社, 1947.

[5] 马俊亚.近代江南城乡经济互动研究 [J]. 史学月刊, 2003 (06):56-62.

[6] 王先明.近代乡村社会变迁与城乡结构演化 [J]. 史学集刊, 2010 (02):38-45.

[7] 赵世瑜.狂欢与日常: 明清以来的庙会与民间社会 [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2.

[8] 蓝勇. 西南历史文化地理 [M]. 重庆: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7.

[9] 严如熤. 三省边防备览（卷十·民食）[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215.

[10] 刘震,郭索彦等.水土综合整治是秦巴山区防洪减灾和改善生存环境的必然选择[J].中国水土保持科学,2004 (04) : 1-5. https://orcid.org/10.16843/j.sswc.2004.04.001

[11] 商州乡土志编纂委员会. 商州乡土志·交通[Z]. 1923: 12. 陕西省档案馆藏, 档案号: 6-2-189.

[12] 陕西省档案馆. 汉中府二十五年工商税收及物资流通统计表 [Z]. 1931: 12-15.档案号: 10-3-456.

[13] 陕南工业劳动力调查 [N]. 西京日报, 1937-06-12(3-5).

[14] 安康专区档案馆. 民国二十六年度财政收支报告 [Z]. 1931: 28.档案号: AK-5-231.

[15] 陕西省档案馆. 汉中茶栈商业档案 [Z]. 1937: 34.档案号: 12-7-892.

[16] 中央研究院. 陕南农业技术推广报告 [R]. 1946: 19-21.

[17] 陕南乡村发展调查 [N]. 安康日报, 1946-08-25(78).

[18] 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陕南民国史话 [M].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8: 45-47.

[19] 国民政府实业部. 中国实业志·陕西卷 [Z]. 1947: 56.

[20] 陕西省档案馆. 民国陕南人口统计年报 [Z]. 1947: 38.档案号: 3-8-567.

[21] 章开沅, 罗福惠. 比较中的审视: 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 [M]. 武汉: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3: 63.

[22] 李伯重. 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29.

[23] 王家范. 中国历史通论 [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 74.

[24] 马俊亚. 江南地区的城乡互动与社会变迁(1840-1949)[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3: 48.

[25] 王先明. 近代华北的乡村治理与危机应对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0: 27.

[26] 赵世瑜. 狂欢与日常: 明清以来的陕北社会生活史 [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2: 65.

[27] 蓝勇. 历史时期西南地区交通开发与社会变迁 [M]. 重庆: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7: 36.

[28] 许涤新, 吴承明. 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一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5: 49.

[29] 彭慕兰. 大分流: 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 [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3: 72.

[30] 沃勒斯坦. 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8: 85.

[31] 费正清. 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 53.

[32] 陕西省档案馆. 陕南战时内迁档案 [Z]. 1937: 67-69.档案号: 19-2-347.

[33] 民国三十年度陕南商贸报告 [R]. 1943: 42.

[34] 汉中市档案馆. 汉中恒丰茶栈商业合同档案 [Z]. 1942: 48.

[35] 安康市档案馆. 安康酿造业乡村原料基地建设档案 [Z]. 1944: 28-30.

[36] 陕西省农业改进所. 陕南农业技术推广年报（1940-1945）[R]. 1946: 47.

[37] 汉中市档案馆. 战时陕南乡村教育与卫生推广档案 [Z]. 1943: 68.

[38] 陕南行政督察区工作报告 [R]. 1947: 73.

[39] 陕西省交通厅档案. 汉白公路乡村支线建设档案 [Z]. 1945: 64.

[40] 民国三十五年陕南乡村发展报告[R]. 1946: 58.

[41] 安康地区乡村经济调查总队. 陕南山区乡村发展现状调查 [R]. 1946: 39.

[42] 汉中市工业志编纂委员会. 汉中工业发展史（1912-1949）[Z]. 1988: 67.

[43] 陕南农业统计年报（1948）[R]. 1949: 45.

[44] 陕西省教育厅档案. 民国时期陕南乡村教育设施建设档案 [Z]. 1946: 76.

[45] 陕西省档案馆. 陕南战时损失档案 [Z]. 1946: 62.档案号: 23-5-678.

[46] 安康县志编纂委员会. 安康战事史料汇编 [Z]. 1990: 49.

[47] 秦巴山区地理环境与区域发展研究课题组. 秦巴山区地理特征与城乡互动研究 [R]. 1945: 37.

[48] 陕西省交通史志编纂委员会. 陕西近代交通史 [M].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5: 54.

[49] 国民政府行政院. 战时后方建设纲要 [Z]. 1938: 48.

[50] 陕西省档案馆. 解放战争时期陕南战场档案 [Z]. 1946: 65. 档案号: 31-2-459.

[51]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民国时期农业经济统计资料汇编 [Z]. 1991: 73.

[52] 陕西省工业厅档案. 民国时期陕南工业建设档案 [Z]. 1946: 56.档案号: 15-3-287.

[53] 全国工业普查办公室. 近代中国工业产值统计汇编（1912-1949）[Z]. 1985: 82.

[54] 中国财政史编写组. 中国近代财政史 [M]. 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87: 49.

[55] 陕西省人口普查办公室. 民国陕南人口迁移档案汇编 [Z]. 1986: 63.

[56] 沦陷区难民内迁史料汇编 [Z].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5: 58.

[57] 陕西省民政厅档案. 民国时期陕南难民安置档案[Z]. 1946: 74.档案号: 8-4-321.

作者简介



李宗明（1983—），男，陕西汉中人，陕西理工大学经济管理与法学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理论经济学博士后，主要从事经济高质量发展与城乡融合发展研究。